

首页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学生活动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群学博客
BBS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电子图书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社会学网站链接

大陆社会学人类

大陆学术网络资

大陆以外地区、

覃录辉 费孝通先生与少数民族的不解情怀——兼论费先生的金秀圣堂情结

作者：覃录辉 发布时间：2011-01-2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费孝通先生与少数民族的不解情怀 ——兼论费先生的金秀圣堂情结

覃录辉

本文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六期

〔摘要〕费孝通先生一生关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感情上，都与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的情怀。费孝通先生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放在少数民族地区，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所有机会在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所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他曾六上瑶山，与金秀瑶族人民结下了极其深厚的情缘。“南岭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学术概念。这一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列成为中国民族格局中的三大民族走廊，是费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关键词〕费孝通；少数民族；瑶族研究；田野调查；学术感情

费孝通先生是蜚声国内外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人类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等。

费孝通先生一生都在关注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感情上，都与各少数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晚年时，他曾满怀眷恋地说：“我始终关心着少数民族兄弟发展的状况。90岁那年，我到佳木斯同江市拜访了赫哲族同胞，并且同那里的同志讨论了‘小民族，大家庭’这个问题；2001年，在兰州召开的‘第六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做了《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演讲，谈了一些自己对民族工作的体会和想法，希望能对今后的民族工作有所帮助。我年纪大了，已经没有机会再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拜访，只能坐在家里，祝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尽快地富裕起来，踏上小康之路。” [1]

还在幼年时，费孝通先生就对中国乡村怀有深厚的感情。1916年，费先生进入吴江县第一初等小学读书，他最喜欢听的课，就是校长沈天民所讲授的“乡土

志”课，认为乡土志讲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从步入学术研究领域开始，他就把自己的研究视角对准了中国的乡村，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农村。新中国成立后，费先生更是倍加关注中国各少数民族。1951年1月，费先生从西南返回北京后，6月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8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不久便带队赴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当年，他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兄弟民族在贵州》系列文章，后由三联书店集结出版。1952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负责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继续进行民族问题的研究，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等多篇文章，分别刊登在《建设》和《新观察》等杂志上。1954年，他深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考察，不久，在《新观察》杂志上连载了《话说呼伦贝尔草原》系列文章。1956年8月，赴西南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知识分子问题调查；10月，被任命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夏，随全国政协视察团考察内蒙古。“文革”期间，费先生受到迫害，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仍念念不忘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进步。“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1978年11月，便赴日本出席联合国“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发表了题为《对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体会》的演讲；12月，赴南宁和银川，参加广西、宁夏两自治区的庆祝活动。1979年10至11月，赴加拿大访问讲学，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柯明斯讲座，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的演讲。1982年2月，赴新疆访问。1983年7月，赴贵州省做有关民族识别问题的报告。1984年8月，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及翁牛特旗考察。1985年6月，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呼和浩特市进行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调查，出席“边区开发”科学研讨会；8月，赴甘肃省兰州市出席“开发大西北问题”座谈会，并赴定西、临夏、甘南考察；12月，赴海南岛进行“地区发展与黎苗聚居区”考察，并在通什市参加“海南开发与发展战略研讨会”。1986年8月，赴甘肃省定西参加“全国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开发学术研讨会”并赴临夏考察。1987年7月，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聚居区及大兴安岭林区考察；8月，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赴内蒙古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并赴甘肃省和青海省海东六县考察边区与民族地区发展状况。1988年7月，赴甘肃省兰州市出席“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研讨会”并赴内蒙古阿拉善盟、宁夏西海固考察边区及民族地区发展状况；12月，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赴广西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1989年1月，赴广西、湖南、广东三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南岭地区考察；5月，赴陕西省西安市参加“城乡发展与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讨会”并发表了《四年思路回顾》的演讲。1990年5月，赴兰州参加“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第一次协调会，做了题为《开发大西北》的发言；并赴云南访问，写作了《重访云南三村》；10月，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考察边区大工业扩散问题，撰著了《包头行》。1991年6月，赴四川省凉山地区考察，在《凉山行》一文中提出关于大西南“一点、一线、一面”的开发思路；9至10月，赴湖南省湘西地区、重庆市黔江地区和湖北省鄂西地区考察山区经济发展及土家族、苗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发表了《〈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后记》、《关于内蒙古经济发展的一些意见》等文章。1995年6月，赴贵州省毕节考察；7月，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考察。1999年7月底至8月初，赴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同江，对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小民族”情况进行考察，看望了赫哲族同胞，深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及经济情况。2000年8月，赴云南昆明参加“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第二次高级研讨会”，并赴大理、丽江调查西部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2001年10月，出席长城教育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研讨会”；11月，赴海南省海口、兴隆、山崖调研城市化发展情况，发表了《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

难以释怀的民族情结

费孝通先生与我国少数民族结下的不解情怀，通观他一生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比比皆是。仅从以下几个典型的事例，便可窥视一斑。2001年3月11日，费孝通先生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高科技扶贫与民族文化保护开发研讨会”。会上，他深情地回忆起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率中央民族慰问团赴黔东南地区访问的往事，并阐发了对苗侗文化的观点。

1950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副教务长的费先生被任命为中央访问团第三分团团长，于7月率团到贵州进行了历时6个半月的访问。在访问调查中，费先生一行的足迹遍及黔东南的镇远、炉山、凯里、黄平、雷山、台江等地。

在黔东南，费孝通先生不仅亲眼见证了少数民族同胞在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历史巨变，而且还以人类学家的独特视角考察了苗族的历史、经济生活及其丰富的民族文化。费先生认为，是苗族和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苗族曾在湖北、湖南等地区建立了大国。苗族的中心地区在清水江流域，但是在黔东南的松桃一带也有苗族区，而且和湘西的苗区相连，过去很可能与清水江流域连在一起。他深情地说，广大的中国疆域，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是哪一个民族所能独立开发出来的，她是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数千年的艰苦奋斗，才逐步建立起这个伟大的中国来。”“中华各族的劳动者既然是中国的创造者，中国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当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人翁。”

历史上贵州流行着一句话：“苗族三十年一次小反，六十年一次大反。”费孝通先生评价说，苗家男、女都很热爱劳动，视劳动为光荣，不仅没有土地的贫民要劳动，就是有土地的人，甚至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人，也不脱离劳动。他举例说，黄平的谷陇区有4100户占人口95%的苗族，没有地主，仅有半地主式的富农10户和富农50户，中农占大多数并占有大部分的土地。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苗族内部平常执行的是活租制，只有很少属于定租制，一般都没有押金，租额一般也要平分。除了帮地主做少量的无偿劳动外，并没有其他残酷的超经济剥削。汉族地主倚仗势力霸占田地，靠剥削过日子，自己不劳动，生活也逐渐腐化。而苗族内部阶级分化不是很显著，苗家克勤克俭，虽在重重剥削和压迫之下，部分人还是能靠劳动发家。日子久了，苗家的经济力量便逐渐上升。腐化了的汉族地主把土地卖给了经济力量上升的苗家，苗家势力也就一步步从山上下来了山下。但是，当苗家农民经济势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有力量来反抗汉族封建势力的压迫时，也就发生了暴动。于是，当地的封建势力就用“平苗乱”的口实动用官兵来“征剿”。经过一度战争后，苗族被大量屠杀了，他们的土地又被霸占了。这样便构成了苗族经济在历史上不断遭受破坏然后再恢复成长的循环过程。这种周期性的民族战争是有其经济基础的。苗族的经济不仅决定了它的政治和周期性的战争，而且也决定和影响了苗族的文化。

费先生认为，苗族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内容丰富，苗族的文化封建主义意识比较薄弱，而且其文艺活动是与劳动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他在文章中热情地赞美道：苗族爱唱歌，爱跳舞。“一提到苗家，谁也不会不联想到他们美丽的服装，活跃的舞蹈，动人的歌唱。‘到处是歌舞’决不是一句过分的话。苗族人唱歌一唱可以唱上半天、一天甚至几天、几晚”。同时，他对苗族的服饰、衣裙、帕子、腰带也赞不绝口，认为它们是最具有民族形式的文化。尤其是苗族妇女“反面绣花正面看”的精巧手艺，既不打样，又不画线，信手绣去，却整齐而又美丽。因此，费先生称她们是真正的“绣花英雄”。然而，当在镇远街头看到不穿苗衣的苗家妇女时，作为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费先生不但批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强迫少数民族搞同化的政策，而且也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民间文化中潜伏着的受汉族文化冲击的危机。

这些精辟的分析和深刻的见解，既浸透着费孝通先生长期以来对苗族社会考察的心血，也映射出他对苗族人民深深的情怀。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直主张文化的多元化。对于侗族，费先生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在贵州东南部，侗族以黎平为中心分布，侗话和仲话(布依话)、水话、壮话均属侗台语系，也就是壮侗语系。从整个分布来看，这些民族属东南亚沿海民族，他们很有可能是因受到汉族统治者的压迫而从东亚大陆沿海向南迁徙的，或是从马来半岛起源，先向北扩张到东亚大陆沿海，又被逼南退的。费先生一直关注着侗族的文化。2001年初，费老已届91岁

高龄，但当得知中国侗族的南北方言结合部——贵州锦屏县九寨侗族地区在平秋民族中学创办了侗族文化艺术业余学校，对九寨的大歌、花歌、曲艺、舞蹈、民居、服饰、饮食、节日、礼仪等民族文化进行保护、挖掘、传承并引入课堂，而且成效显著时，即欣然命笔，为该校题写了校牌：“贵州锦屏县九寨侗族文化艺术业余学校”，以示他对侗族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传承的关心与支持。[2] 费孝通先生对云南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视云南为“第二故乡”，他曾深情地说，云南是他“学术生命、政治生命和家庭生活的新起点”。

深厚的“云南情结”，使费先生曾数度重返云南。1956年，费先生来到云南，参加民族历史调查研究，到了德宏，后沿着洱海进行了考察，写了不少有关少数民族的文章，为云南少数民族说了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话。因此，深受少数民族爱戴，称他是个“比少数民族还少数民族的人”。

20世纪70年代末，费先生刚刚重获学术生命，便再度到云南考察。2000年，应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研讨会之邀，费先生再一次来到云南大理和丽江考察。故地重游使费老感触很深：“一路浮想联翩，觉得云南的人文资源太富饶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还赞扬了云南省对大理、丽江古城的保护。然而，当费先生听到纳西象形文字老专家建议在学校推行“三语”（汉语、外语、纳西语）教育时，马上表示：“纳西族象形文字是一种比汉族文字还古老的文字，其使用范围已经极狭窄了，现在要学生除了学汉语、外语再去学它，有什么实际用处？学生的负担是不是太沉重了？”他认为：“我们应培养一批专家来研究东巴文化，包括它的文字，但是普遍推广就不现实了。”当他观看完纳西族的“祭天”仪式表演，便十分敏锐地提醒：“作为一个人类学、社会学者，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种古老的仪式，表现了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意识，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讲平衡和谐，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与自然对立。这与西方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掠夺自然为我所用的观念截然不同……但是，在观看仪式的整个过程中，我总感到树底下弥漫着一股迷信气氛。当我在丽江东巴文博物馆看到表现东巴祭礼真实场景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时，不由得又产生了这种感觉。”费先生提出：“保护不是无选择的、原封不动的保存，要有鉴别、有取舍。”[3] 拳拳民族情，寥寥几句话，便道出了费孝通先生对云南少数民族的一片深情，也显示出一名著名学者纯朴的良知和渊博的学识。

早在1938年，费孝通先生完成学业后自英伦回国。当时，由于国土沦陷，他只得从越南西贡登陆，再转道到昆明。不久，便和他的助手张之毅先生去禄丰搞实地调查。一年后，先后撰写了《禄丰农田》、《易门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与商业》。这就是著名的《云南三村》。

这次调查工作从当年11月15日起至12月13日止。次年在教学期间，费先生将调查材料整理成文，并于8月3日乘着暑假，第二次到云南楚雄禄村进行调查，考察了一年来禄村的变化。10月15日，费先生返回云南大学，开始了《禄村农田》的写作。1940年，《禄村农田》一书面世。

《禄村农田》作为《江村经济》的续篇，是费先生早期的力作，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学的名著。费先生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禄村是“差不多完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事业的内地农村结构，它的特色是众多人口挤在一狭小的地面上，使用简单的农业技术，靠土地的生产来维持很低的生计”。如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出路，提高劳动力的价值，这是费先生通过云南禄村调查提出的内地农村面临的现实问题，他认为“农村应当发展自己的乡村工业”。为了寻找典型，探索农村发展的这条新路子，费先生与张之毅一起，来到乡村工业较发达的易村从事不同类型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张之毅写出了《易村手工业》一书。费先生在该书序言中强调并阐明了必须发展乡村手工业的观点。从此，费先生一直关注着禄村的发展，直到几十年后，还深情地认为云南楚雄州“是我的第二故乡”。

1990年5月26至30日，费先生以80岁的高龄，从北京来到了阔别整整52年的禄村和易村进行走访调查。调查期间，他对内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做了分析比

较，认为“无工不富”是经实践证明了的真理。他与村里的干部群众座谈，共同探索发展路子，还向他们介绍了外地的一些发展经验，诱导他们打开思路。当费先生参观王建国在村里开办的塑料厂，并得知厂主是当年房东的侄孙时，高兴极了。重访禄村、易村，他的愿望是“希望我的第二故乡很快发展起来”。他认为：“农村经济要发展，关键靠两条，一条是搞家庭副业，也就是庭院经济，形成专业，一村一业”。“另一条是搞大企业扩散……”他指出：“只要基层干部都忙了，忙成企业家了，上下结合了，农村经济的局面就出来了。”

离开楚雄前，费先生还写下了一首抒怀诗：“五尺道开南国通，滇彝文化数楚雄；苍翠山林今犹昔，百花争艳遍地红。”

孜孜眷念的南岭情怀

南岭地区横跨湖南、广西和广东三省(区)，分布着大约80~90万瑶族，是我国瑶族的主要聚居区。

1988年12月，费孝通先生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在南宁、玉林、梧州等地慰问各族群众之后，费先生不顾78岁高龄，进入南岭山脉瑶族聚居区，考察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恭城瑶族自治县、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和江永县、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等。在这次考察中，费先生对瑶族的历史与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等都做了深刻的论述。

费先生指出：瑶族是南岭山脉中一个主要的少数民族，可能也是移入南岭较早的一个民族。瑶族是一个内部异常复杂的民族，内部语言不是统一的，主要说勉语，但也有讲苗语和侗语的，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就分为五个支系。这说明瑶族不是同一个来源，它是一个复杂的民族。自宋代有了“瑶”的族称开始，瑶族就开始了迁徙，从湖南向南深入到广西、广东，瑶族的人口分布和中心区域发生了转移，粤北和桂东北成为新的瑶族中心区域。到元代，湖南瑶族继续南下，使广东、广西的瑶族分布更广，人口更多。费先生精辟分析道：元代瑶族迁徙史上的大事是瑶民逃离千家峒，也就是瑶族开始从南岭山区迁徙。明代以后，千家峒瑶民的后裔与这个地区其他瑶民一起向广东、广西腹地迁徙，后来才又迁徙到广西西部与云南地区。[4]因而，瑶族是与苗族、畲族关系最为密切的民族。

费先生还实地考察了湖南江永县的千家峒。他认为，千家峒是居住着一千户或几千户瑶家的小平原。在瑶语里，“峒”实际上是一块盆地，四面是高山，中间是盆地，盆地里有山上流下来的水灌溉农田。千家峒是很典型的瑶族早期居住的一种情况或一个条件，在这种条件之下，瑶族生活过得很不错，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写的一样。瑶族在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外面的变化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在这里面生活的人人情味很浓，大家友好往来，和睦相处。

1988年11月，费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上，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在这次演说中，费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5]时隔一个月后，费先生正是在这次南岭考察中继续深化这一思想的。费先生生动地说，汉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里面的成分很复杂，包含了很多民族成分。汉族有文化优势，正是依托这个优势，中华民族才形成这么大的一个集团；靠这个优势，各民族都渗透到这个集团里面去了。当然，中华民族也包括了各个民族的力量，这样才形成了一个特性，造成了一个中华民族。

在南岭考察时，费孝通先生再一次深刻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费先生指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

费先生进一步指出，国家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给了民族地区很多优惠的政策和条件。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要挺起腰杆子，腰杆子挺得直直的，制定法律的人会支持你们的；要逐步转变观念，要考虑如何用好活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是光想着要钱。[6]

世居于南岭山脉的瑶族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大体相同，在改革、开放、发展山区经济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大体上也是相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南岭山脉的瑶族地区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南岭山脉的瑶族同胞十分渴望能够相互交流经验，探讨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在引进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及商品流通等方面进行协作。但是，由于南岭山脉横跨三个9省(区)，山重水复，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费孝通先生高瞻远瞩，在南岭考察时指出，两省一区的瑶族地区应该建立一个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并进一步具体指出，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的规模开始不能太大，要先从小范围开始，待到有了经验后，再考虑扩大。他还介绍了成立黄河上游开发区的经验，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少数民族地区一定要学会这一条，要自己想办法来增加生产，提出发展规划，向上面要政策。后来，费先生在和两省一区领导进行座谈时，与他们就南岭山脉瑶族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交换了意见。费先生建立南岭瑶族经济开发协作区，帮助瑶族加快经济发展和脱贫致富的建议，受到了南岭地区各级政府和瑶族人民的重视。

南岭山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南方少数民族的生存地和迁移通道，是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地区，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进行南岭山脉民族研究的宝贵资源。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地区的民族研究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费孝通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睿智的学术眼光，把研究的触角多次探及南岭地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南岭民族走廊”学说。“南岭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这一走廊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并列成为中国民族格局中的三大民族走廊，是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费先生第一次提出“南岭走廊”，是与中华民族棋盘式分布格局一起提出的。1981年12月，在中央民族研究所座谈会上，费先生指出：“从宏观的研究来说，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7]

1982年5月，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学员座谈会上，费先生第二次提出“南岭走廊”，这次是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一并提及的。对这条位于中南的“走廊”，费先生说：“广西、湖南、广东这几个省区能不能把南岭山脉这一条走廊上的苗、瑶、畲、壮、侗、水、布依等民族，即苗瑶语族和壮傣(侗)语族这两大集团的关系都搞出来。这里各种民族有其特点，山区民族就同傣语系各族不一样，以后发展的前景也不同。”“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7] 费先生殷切希望南岭附近的桂、湘、粤等省(区)的有关研究者加强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使大家对南岭“民族走廊”的认识更加清晰。

费先生第三次提出“南岭走廊”，是与“六江走廊”、“西北走廊”一起提出的。1984年，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费先生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现状，建议“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搞。因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我们不妨从六江流域作为一个地区开始综合研究。南岭走廊也是一个地区，西北是一条走廊。按地区去研究民族历史的方法，不是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很多人在工作里面感到困难，才找到这条路子的”。[7] 这一

次，费先生还提出了民族史研究的方法应以“民族走廊”为切入点，这无疑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费先生第四次提出“南岭走廊”，是在1986年5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一届瑶族研究国际研讨会”上。费先生指出：“中国各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可以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曾被拉铁摩尔所称的‘内部边疆’，即我所说的藏彝走廊，然后是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岛屿及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民族过去和现在。从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来看，各族人民流动的总趋势是北方民族的南下或西进，中原民族的向南，沿海民族的入海或南北分移，向南移的又向西越出现在的国境。我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就是在这种迁徙变动中，逐渐融合许多古老民族而形成的。”[7] 费先生的这次发言，不仅是对1981年他第一次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的进一步完善，而且还指明了中国民族迁移的大势和汉族形成的原因。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单独就大瑶山所在的“南岭走廊”地区提出了研究的思路：“希望能从近年来的大瑶山调查开始，发展成为以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为主的综合性调查。这里面有作为山居民族的瑶族的各方面问题；有瑶族和跟它接近的苗族与畲族的关系问题，这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渊源问题，也是对相类似的山居民族的比较问题，包括了苗、瑶、畲族与壮族、侗族、布依族以及土家族等在历史上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有什么差异的问题，以及长期历史上汉族在这个地区的作用问题，汉族与上述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研究好了，不仅有助于上述各族历史的研究，而且也可以大大丰富中国通史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各民族情况的深刻了解。”[7] 可以说，这是费先生自从事大瑶山瑶族历史社会调查研究后，对“南岭走廊”所做的最详尽、最具体的阐述。

费孝通先生的“南岭民族走廊”学说在学术和现实意义上的贡献是巨大的。费先生的“南岭走廊”学说是他在长期对南岭瑶族历史社会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南岭走廊”学说涉及南方壮侗和苗瑶两大语族的十多个民族，是研究这些民族迁移、发展历史以及了解各民族间社会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途径。同时，“南岭走廊”学说在一定程度上还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我们“一盘棋”式全面研究南岭诸民族的基石，不仅对解决民族学、民族史学的许多重大问题、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也对南岭民族研究基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终生不渝的瑶山情缘

我国瑶族人口约有240万，在全国56个民族中居第13位。瑶族分布在南方，主要居住在广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五省，分布格局呈大分散、小集中。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瑶族人口最多，有40余万，大多集中在金秀、都安、大化、巴马、富川、恭城6个瑶族自治县，其中金秀瑶族自治县是我国著名的瑶族聚居地，拥有“世界瑶都”之称。

金秀大瑶山是个美丽神奇的地方，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翠，溪水潺潺，古树参天，闻名遐迩的圣堂山雄踞县境内。整个金秀瑶族自治县自然景观雄奇秀美，民族风情异彩纷呈，人文景观价值很高，民间文化非常丰富。县内居住着盘瑶、坳瑶、茶山瑶、山子瑶、花蓝瑶5个瑶族支系，是世界上瑶族支系分布最多、民族表现最为典型的地方。登上县城边的一座小山，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由费孝通先生亲笔题写馆名的“瑶族博物馆”。

正是这个深处南岭山脉腹地、圣堂山怀抱之中的小县城，却成为一代社会学、民族学泰斗费孝通先生终生难忘的地方，促使他与金秀瑶山人民结下了极其深厚的生死情缘。1935年，当时的广西政府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的课题，向清华研究院求助，希望派人来桂支持。1935年8月的一天，费孝通、王同惠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婚第四天便惜别恩师，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途。从北京到广西，辗转两个月。他们一到南宁，顾不上路

途的劳累，第二天便与广西教育厅和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订社会调查方案，查阅资料。1935年10月10日，费孝通夫妇离开南宁，在翻译和向导的带领下前往大瑶山。10月18日，他们从象州进入大瑶山腹地金秀东南乡。

当时的大瑶山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山高路险、人烟稀少的地方调查，其艰辛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这对年轻的夫妇全然不顾，一边做社会调查，一边向内地发回《桂行通讯》报告，在《北平晨报》和天津《益世报》上连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金秀瑶山，费孝通先生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王同惠女士则进行社会学调查。他俩在大瑶山忘我地工作，生活“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8]

1935年12月16日，他们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进行调查。一路上，古陈村派出的向导在前面带路，费孝通、王同惠相互搀扶着跟在后面。行至五指山冲口处时，怀有身孕的王同惠累得满头是汗，于是费孝通先生将她扶到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可就因为这一歇，他们与走在前11面的向导失去了联络，迷失了方向。天慢慢黑了下来，费孝通先生抬头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像是房屋的建筑，以为是人家，便前往探身察看，不想却“轰隆”一声掉了下去。原来这是猎户为捕兽所设的陷阱。王同惠见状，用尽全身力气把压在费孝通先生身上的木头和石块搬开。见丈夫腰部、腿部都受了重伤，无法站起来，便将他扶到附近的地上坐下，然后急匆匆地下山找人来救费先生。谁也没有料到，她竟坠落到古陈与罗运交界处一个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再也没有回来。

王同惠女士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而遇难的女学者，遇难那一天，是她和费孝通先生婚后的第108天。瑶民们按照瑶寨风俗，为王同惠女士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第二天，副乡长挑选了几位身强体壮的瑶族男青年，分别抬着王同惠女士的遗体 and 身负重伤的费孝通先生离开了东南乡古陈村，经平南县到达桂平县江口圩渡口上轮船。船到梧州后，费先生将爱妻埋葬在梧州白鹤山上，他请人精心设计了陵墓，并拖着重伤之身亲笔题写了碑文。

在广州，费先生的伤情稍微好转，便立即着手整理王同惠女士在瑶山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撰写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署名为王同惠，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金秀瑶族的族源、语言、民风礼俗、信仰、典章、生活、劳动、卫生、教育、家庭关系等情况，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

1939年，年仅29岁的费孝通先生根据对家乡吴县下弦弓村的考察，写下了轰动中外学术界的《江村经济》。在《江村经济》的卷首，费先生满怀深情地写着：“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88年12月，值王同惠女士罹难53周年之际，费先生来到梧州，追忆与爱妻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的难忘岁月，赋诗感叹：“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圣堂山下盟，多经暴风雨；坎坷羊肠道，虎豹何所沮；九州将历遍，肺腑赤心驱；彼岸自绰约，尘世如蚁聚；石碑埋又立，荣辱任来去；白鹤展翼处，落日隈远圩。”

爱妻的离去，成为费孝通先生心中永远难忘的痛楚。但是，真挚的爱情，却激励着费先生在学术的道路上不屈地前行，也牵萦着他孜孜不泯的瑶山情怀，使大瑶山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此后，费先生不管走到哪里，都始终没有忘记广西大瑶山，没有忘记金秀的瑶族同胞，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继续完成着爱妻未竟的瑶山调查研究工作。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费孝通先生写道：“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在金秀瑶族博物馆，展示着费先生一段感人肺腑的话：“……这里是我重新进行民族实地调查的起点，也是日夜令人魂梦神牵之处。”“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瑶山并不是陷阱，更不是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友爱的桃源！”

费孝通先生一直怀念着大瑶山，怀念着大瑶山的乡亲们。晚年时他曾经说过：“1935年瑶族调查是我学术生命的开始。”他曾先后五次重返瑶山，看望“充满友爱”的瑶族人民，为金秀瑶族自治县奉献自己的智慧。

早在1951年，费先生率领中央民族访问团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慰问并领导民族区域自治试点时，就派副团长金晓一、陈岸代表他到大瑶山慰问，并参加和指导大瑶山各族代表讨论制订《大瑶山团结公约》，从而填平了瑶族内部近600年来的鸿沟，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解放了生产力。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费孝通先生应邀前往，顺路重返阔别了43年的大瑶山。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大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一文中，用“换了人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后来，他又专门委派胡起望、范宏贵到金秀继续进行调查。1983年，他亲自为胡起望、范宏贵撰著的《盘村瑶族》作了序：“胡起望、范宏贵两位同志所写的《盘村瑶族》即将出版，因为这个研究是出于我的倡议，所以我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说明这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9]

1981年，费孝通先生三上瑶山，通过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六、七十年代的“以粮为纲”，对金秀大瑶山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了重大的破坏。而且，“由于自治县划界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瑶山经济建设的需要，没有强调山区和平地的经济交流，把原来山区贸易所依靠的集散点划在界外，加上山区公路建设困难，自治地方得不到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反而受到县界的束缚，有点像‘画地为牢’”。[10]因而阻碍了山区和平原、瑶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为此，他对新时期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建议：“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团结，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样对汉族、对少数民族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发展的条件来划定自治地方的区域。”[11]在他的建议和具体帮助下，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管辖范围得到较好的调整，为瑶山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2年8月，费先生四上瑶山，应邀前来参加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来金秀之前，他打听到47年前的老住户兰绍中和他母亲还健在，便特意在北京买了精美的糖果和糕点，还给兰绍中的母亲缝制了一套“花蓝瑶”服装。在金秀，他与兰绍中促膝谈心，共叙衷肠；广泛接触群众，关心瑶胞疾苦。在耳闻目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瑶山的巨大变化后，费先生感叹道：30年来瑶山的变化很大，金秀是大有希望的。在《四上瑶山》一文中，他表达了对大瑶山发展多种经营和科技致富的赞许。他表示，我还要来瑶山，因为这里充满着民族的友爱和情谊。

1988年12月，费先生带着外孙女张勤、侄儿费皖五上瑶山，这次不仅到了金秀县城，而且直接乘车到了当年的调查地六巷，见了当年的老朋友，也拜谒了王同惠女士的纪念亭。来到金秀六巷，53年前他和王同惠初上瑶山时的老房东蓝妹国老奶拄着拐杖迎上前来：“费先生，我终于把您盼来了！”费老也激动地叫了声“大姐，您好！”阔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两为老人，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临离开时，费老深情地说：“我今年已78岁了，不知以后还能不能来，现在想多看一眼。”他边说边抬眼望着六巷村，似乎在寻找当年和王同惠女士曾经住过26天的那间平房。

2002年，正值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已年届92岁的费老仍欣然应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然而，由于不慎跌伤了腿，费老的心愿未能实现。11月25日，他给金秀瑶族自治县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我本应亲赴金秀祝贺，但日前不慎跌了一跤，虽无大碍，却不得不遵医嘱卧床静养。故只能遥祝金秀瑶族自治县人民在县党委、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金秀建设得更加美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12]

费孝通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过：“世界瑶族研究中心在中国，中国瑶族研究中心在金秀”。金秀瑶山既是费先生田野调查的起点，也是他民族研究的起点。

大瑶山的考察，为费孝通先生奠定了学术研究的方法。1987年，费先生勾画了自己学术发展的轮廓：“我的行文格调在20年代末已经形成，治学方法在30年代

山是费老社区检验的实践；《花蓝瑶社会组织》基本上是瑶族社区的功能分析。在《乡土中国》的各章节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大瑶山的影子，特别是在“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内容上，大瑶山的“世外桃源”印象、石碑制度下的社会组织、瑶老统治下的礼治和秩序，也是以大瑶山社会作为比较基础的。费先生说过：“我从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他们只是分布在国内外各地的瑶族的一小部分——的历史经过，从而想到中华民族的形成……”[9]因此可以说，他的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源泉实际上也来自大瑶山考察。大瑶山既是费先生一生学术的出发点，也是他一直耿耿于怀的地方。他曾经说过：“我原本打算自己亲自参加大瑶山的社会调查……但是在实践中发现自己已不是四十多年前的青年人了……当然，我心中一直放不下的这一笔欠账，今生很难有亲自偿回的希望了……这对我本人来说不能不是件憾事。”[9]“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7]费先生在晚年时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13]

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在学术上也对费孝通先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费先生曾清楚表明：“我为什么倡议在广西大瑶山，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偕同前妻王同惠一同进入广西大瑶山……该年12月16日，我们在从花蓝瑶地区转移到坳瑶地区的旅途上迷失道路。我不慎误踏猎人设下的陷阱，腿背受伤。前妻下山呼援，天黑路险，溺水丧生……这次调查却并未完成……我的体质测量资料后来全部遗失在昆明。因此，我一直遗憾在心，觉得是一件此生没有还清的欠账。1978年我应邀去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返途上我去访问了一别45年的大瑶山。当地的瑶族同胞还记得我，而且听说当年接待过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不少在世。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想继续在瑶山进行上次没有完成的调查。这是我做出大瑶山社会调查倡议的来由。”[9]费孝通先生在《花蓝瑶社会组织》重版前言里写道：“作为一本我在青年时代和亡妻合作的学习成果，我也无意在此作自我评论，只想说在重读时不断发现我后来所发表的许多学术观点的根子和苗头，因而想到这本书对于那些想了解我学术思想发展过程的朋友可能也是有用的。”[8]他和爱妻王同惠合著的《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仅以数万字的篇幅，就展现出完整的花蓝瑶社会结构，吴文藻先生评价道：“我们看过这本花蓝瑶的社会组织以后，就不能不承认该族社会组织的严密，文化配搭的细致。”[8]在养伤期间，费先生在家乡开弦弓村做了调查，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得到导师马林诺斯基的高度赞誉；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他坚持到云南农村做调查，他的《禄村农田》指向内地农村的土地制度，也带着比较研究的视角，标志着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的进一步成熟；改革开放以后，他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沿着城乡发展和民族研究这两条大线索精心耕耘。费先生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形成过程时，曾经强调：“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14]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暮年漫谈》一文中说道：“自从进大瑶山与瑶族同胞接触以后，‘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才在我的脑子里比较清晰起来。”通观费孝通先生的一生，无时不在关注着我国各少数民族人民，他的言行举止，无不倾注着对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费先生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放在少数民族地区，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所有机会在祖国各民族地区做实地调查。费先生几乎走遍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海南岛黎族村寨，从云贵高原到南岭瑶山，从黑水之滨到凉山彝区，从新疆到宁夏，从湘西鄂西到甘南藏区……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迹。他给我们留下的对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一片深情，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志在富民”的思想，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等，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中国少数民族研究，

为加速民族地区发展，为维护各民族间的团结、平等而不懈奋斗。

作者简介：录辉(1952—)，男(壮族)，广西忻城县人，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社长、总编辑，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民间文化、民族新闻出版及编辑学。

(参考文献)

- (1) 胡起望, 范宏贵. 盘村瑶族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 (2) 陆景川. 费孝通与黔东南的情缘 [N]. 北京: 中国民族报, 2009—04—10.
- (3) 石鹏飞. 费孝通的“云南情结” [J]. 昆明: 云南大学学报, 2001, (672).
- (4) 宫哲兵. 千家峒运动与瑶族发祥地 [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1.
- (5)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 (6) 王戈柳.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 (7) 费孝通. 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 [A]. 费孝通文集(第8卷) [C].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 (8) 费孝通, 王同惠. 花蓝瑶社会组织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 (9) 费孝通. 盘村瑶族·序 [A]. 胡起望, 范宏贵. 盘村瑶族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
- (10) 费孝通. 关于编写《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的一些意见 [A].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 (11) 费孝通.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 (12) 费孝通. 六上瑶山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 (13) 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 (14) 费孝通. 城乡和边区发展的思考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责任编辑:fang

【大 中 小】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首页](#) > [社会学研究](#) > [推荐阅读](#) > [推荐阅读列表](#) >

Copyright © 2007-2010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